

# 美國芝加哥市華人社區組織發展初探

林 芊

——本文為作者在本中心與政大社會系合辦之  
「都市社區的守望相助」研討會中之講詞

## 一、前言

去年米高梅電影公司製作了引起很大爭議之「龍年」(Year of Dragon)一片。該片描述美國紐約中國城中黑社會組織猖獗的內幕。此片被各界人士，尤其是中國團體喻為充滿種族歧視色彩。在加州、紐約等地上映期間，以中國人為主之示威團體在戲院外遊行抗議，並呼籲各界加以杯葛。在此之前，芝加哥雜誌 John Conroy (一九七八)亦以中國城為題，撰寫「中國城之黑暗面」，以鬼影幫滋事為起頭，牽出一連串中國體面階級魚肉自己人之事實報導。其中 Coroy 頗帶諷刺地指出：「觀光客在中國城是非常安全的，因所有的受害者均為中國人……(The Street are Safe for Tourists: All the Victims are Chinese)」。

## 二、美國都市中國城形成之原因

有關中國城形成之原因，學者論著頗多。雖因個人著重點之不同而看法不一，但大體上則歸諸於二個主要因素：

一為中國人本身特殊之文化移民背景 (Chinese Culture Pattern)。二為美國社會之歧視 (Host Society Discrimination)。

早期中國移民來自福建、廣東兩省。因天災、饑饉，窮人家子弟不得不出外討生活。一八四八年加州產金的消息吸引了大批的中國人來美，由於中國人「安土重遷」的觀念，這些到美國來的中國人多是單身前來，目的不在移民久居，而是想多賺點錢，供養仍留在家鄉之父母親人，總期望有一天存足了錢之後「衣錦還鄉」。這種視自己在美國為寄居人 (Sojourner) 之心態，由 Paul Siu 於一九五二年提出之後，許多學者用以解釋中國城形成之起因 (e.g. Barth, 1964)。Lyman (一九六八) 更進一步指出此寄居取向為日後中國移民將其老家之組織制度轉移到移民地之原因。他們因為不打算久居，對打入美國社會沒有很大興趣，更覺得花功夫學習英文、接觸了解美國社會是不必要的。於是他們自願地集居在一起，形成中國城，以保存生活在舊有老家之文化傳統。

另一方面，不少學者亦指出，中國城之產生，並非完全出於自願，而是在白人社會的逼迫下被孤立的結果 (Lee, 1973; Patterson, 1975; Morton, 1973)。十九世紀中葉，福建、廣東兩省因兵亂及饑荒，致許多人離鄉背井到美國採金。加州除採礦外，還提供了許多工廠就業機會。由於中國人的勤勞及廉價工資，很多工廠願意僱用他們。故中國移民人數急遽增加，由一八四八年之四〇人增加到一八八〇年之一〇五、四六五人 (Tung, 1974)。當時之美國西部，種族間的歧視仍然很濃，不僅僅是白人歧視有色人種，英國、德國及愛爾蘭之移民也有紛爭，互相敵對 (Chen, 1980, p. 130)。由於中國人數眾多，在文化習俗及外貌上和白人迥異，在一八七六年之經濟不景氣中，首當其衝，被白人指控為失業之主要禍首，造成一連串對華人之暴力事件及「排華法案」之通過。其中包括禁止華工及其妻兒入境；不准華人購買土地，限制華人營業時間及對華人加徵稅額等。在文化方面，加州政府亦以衛生為理由，強迫華人剪去辮子。華人在職業選擇方面，備受限制與歧視，謀生日益困難。在四處被排擠之情況下，退而聚居中國城，發展出以洗衣店、餐館及雜貨店，這些僅需對美國社會做最有限接觸之職業為主之特殊經濟型式。

### 三、中國城之重要社會組織

我們姑且不論中國城形成之主因是中國人不願被同化，或是美國社會的歧視，中國城在中國移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在一九四〇年代以前，居住在中國城內之華人吃、住、工作以及社交活動等均在此。早期中國城內之社會組織，多半以宗族血緣及地緣關係為基礎。以宗親會、同鄉會及秘密會社等方式出現。這些組織在與美國社會相互諒解下，負責解決及控制中國人之一切事務。由於中國城的發展及美國人的排華，造成華人社區益發地依賴這些團體解決問題。而美國人亦以這些組織之代表為中國人之代表，使這些組織對華人之控制力益發加大。

宗親會在美國最常見的是由同姓組成，以「公所」或「堂」稱之。在美國最大的是王氏公所（Wong Family Association）及李氏公所（Lee Family Association）。在芝加哥地區人數最多勢力大的則為梅氏公所（May Family Association）。同鄉會則為來自同一地區人的組合，以「會館」或「堂」稱之。宗親會及同鄉會的功能在於照顧同宗或同鄉。替他們解決生活、職業各方面之問題及調解糾紛。同鄉會之勢力尤大。一八五四年六大會館組成中華公所，於一九〇一年易名為中華會館（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在舊金山地區習稱「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一般中國城居民則以中華（Chung Wah）稱之。所有較有勢力的同鄉會及宗親會，以及中國社區之各類組織團體，均有代表參與其董事會。中華會館對內統攝一切華人事務，對外則是爭取華人權益之代言人。至今中華會館在全美各大中國城中均設有分社，但勢力已大不如前。

除宗親會及同鄉會外，中國城內另有一個不容忽視之組織為秘密會社，俗稱「堂號」。一般是由那些不屬於中華會館之小宗親會及同鄉會，為顧及他們的利益而組成。由於中華會館未能有效地改變美國社會對華人之暴力歧視及阻止移民法通過，造成華人對其不滿，秘密會社因之興起，在十九世紀末期，掌握了全美中國城之黑社會。常因爭奪地盤及對賭博、販毒及娼妓之控制而發生

堂鬭（Tong War）。到一九一〇年以後才稍有收斂。中華會館中之商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生意，想辦法安撫進而控制了這些秘密會社，將「堂」廢棄不用而改稱較體面之「工商會」。譬如芝加哥勢力最大之秘密會社為安良工商會。其美侖美奐宮庭式之大樓座落在中國城之主要街道。安良工商會及中華會館早期控制了芝加哥整個中國人社區。任何人若不遵守其規定，就無法在芝加哥生存。這種情況，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美國社會的開放，中國人中產階級之興起，及大量新僑於一九六五年移民法修改後，自香港、臺灣、東南亞及大陸移入後已有所改變。

### 四、芝加哥之中國城

芝加哥之中國城位於 Armour Square 社區（Cermak, Road 31st Street, Halsted Street），鄰接黑人區。美國大部分主要城市之中國城均位於該市商業中心附近。芝加哥是一個例外。中國城目前的位置距市中心（Loop）尚有一段距離。實際上，舊有的中國城的確位於市中心地段（Clark St. between Madison and Harrison Road）。其所以遷移到現址，主要基於二個原因：第一，一九一〇年代，中國社區中二個主要的「堂」——安良堂及協勝堂競爭激烈，結果協勝堂留在原地 Clark St.，安良堂則搬遷到 Armour Square。第二，一九一二年左右，芝加哥全市更新，在 Clark 街上中國人經營之店面及住屋租金暴漲，很多中國人因付不起房租而遷移到較偏遠之 Armour Square, Cermak 及 Wentworth 街（Gibb, 1969; Moy, 1978），漸漸發展成今日南邊之中國城。Armour Square 原為愛爾蘭人、德國人及瑞典人移民區。一九〇〇年義大利人及南斯拉夫人取而代之。到中國人遷入之時，義大利人在該區已形成相當勢力。雖然由於附近黑人的增加及中國人不惜重金購置房產，致使很多義大利人搬離該區。但到今日，仍有為數甚多之義大利居住該區。

芝加哥之中國城在地域發展上頗受限制。城北為大片之 Sante Fe 鐵軌地，城之東、西、南邊則被二條高速公路回繞。目前中國城之心臟地帶，亦即

商業中心只集中東邊之 Wentworth 及 Cernak 一條街。不少成功之商人嘗試將生意擴展到此區以外，均未成功。故芝加哥之中國城，與紐約或舊金山相比，在規模上要小得多。然而，在功能上它跟紐約及其他的中國城一樣，為移民適應新社會之一緩衝區。

居住在中國城之居民並非一成不變，生於斯，長於斯的。一九四〇年代以後，美國總統廢除了種種排華法案。第二代之華人，由於沒有語言的障礙，又受了較好之教育，在較平等之待遇下，有較多職業上的選擇。這批新進之華人中產階級開始搬往郊區，離開所謂之種族性貧民區 (Ethnic Getto)。一九六五年詹森總統廢除移民配額，新移民法規定每年每個國家可有二萬人之配額。此移民法在一九六八年正式施行之後，大量華人自香港、中國大陸、臺灣及東南亞地區移入。雖然比起早期移民，新移民之教育程度較高，也較多專業人員，但仍有為數不少之新移民因言語不通，生活困難而依賴中國城，造成中國城人口之再度增加。這個情況在芝加哥亦十分明顯。芝加哥全市居民於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間減少了五·二%，但中國城之人口卻增加了一三〇%。一九八〇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芝加哥中國城之人口約有八千人。而實際上之人口當不止此數。在有限的空間下，人口的增加使得居住環境擁擠，很多公寓及地下室均以三夾板分隔出租。根據 Conroy 之描述，在 Cernak 街上一層公寓可隔成十間分別出租。由於住屋難求，房東只顧收租而不從事整修，常有窮人，尤其是無依之老年人居住在狹小的空間，以報紙為牆上裝飾，與蟑螂為伍。芝加哥市政府在中國城之西邊興建了一棟老人公寓 (Senior Citizen Public Housing)，老人之居住情況稍有改善。另外，一些有能力之商人亦出資在城南濱臨高速公路附近興建一批住宅。但也只能容納五〇個中產階級家庭，對整個中國城之居住情況可說是無濟於事。

在社區活動方面，情況更不理想，整個中國城，沒有供青少年活動諸如體育館、青年會等場所，也沒有電影院等一般居民之娛樂場所。兩年前，當在 Wentworth 街上的 A&P 連鎖超級市場倒閉之後，社區中多人建議屋主將場地捐出改建為社區休閒場所，但因屋主拒絕而作罷。(註一)

對新移民來說，最切要的問題在職業的尋找。大多數的新移民，若不會說

英文，所能找到之工作多為餐館之侍者，廚師，或是洗碗工人。通常工作時間很長，工資卻可能是美國政府規定最低工資之%。一般餐館亦無假日及醫藥保險，工作也沒保障。英文稍可之新移民則有較多的選擇，可在附近之工廠找到工作，薪資較高，亦有較完善之福利保險制度。

前面曾說過，由勢力較大之宗親會及同鄉會所組成之中華會館有統攝中國城事務之權力及解決問題，調解糾紛之功能。以目前中國城情況看來，其是否有能力實踐其功能已成疑問。這些中國城之房東、地主及雇主均為中國人，且多是宗親會、同鄉會及秘密會社之主要成員。他們似乎非但未盡到照顧之責，反而造成「非不得已，不替中國人做事」之情勢。Conroy 在其文章中指責這些「體面之商人」，與鬼影幫分子無異，以榨取自己人為生。這個情況部分是由於中華會館勢力薄弱，已無法有效地控制其成員，在分配資源上達成協議。個別商人，多以私利為重而罔顧其對員工之責任。舉例來說，去年 Sante Fe 有意出售在中國城北邊之鐵軌地，此對苦於無處發展之中國城不啻是一大福音。但在招標之前，在中國城有地之商人，恐其既有之房產貶值而不支持購買 Sante Fe 地與建新社區。而支持者中，又因意見分歧，一度有兩個相關之委員會互相競爭。知者莫不搖頭。中華會館之失勢主要基於二個原因，第一、華人在美的人口組成已有所改變，以往多為在中國出生之單身男子，今日之組成則以家庭為主，且在美出生之人口比例增加。小家庭只要累積一些資金即可自己經營小生意，而在美國出生之華人，由於熟悉美國之語言文化，有機會打入美國社會，對傳統之權威如中華會館有較多之不服與不滿。另外，單身人口之降低使得秘密會社所經營之賭博、娼妓等行業重要性減低。此種種原因，使得中國人對此等組織之依賴減低而造成其控制力減弱。第二、中華會館應付美國社會、替中國人爭權益之周旋能力亦減弱。這個情況可以中華會館和芝加哥政府之互動看出。中華會館早期不僅在中國城有絕對之權威，外國人亦尊之為芝加哥區全體中國人之代言人。所有在中國城之商店需要到中國會館註冊登記後才算合法。在革命抗戰期間，中華會館向每個商號徵收稅金資助國民政府。抗戰結束之後，中華會館利用剩餘尚未匯給國民政府之資金及各方捐贈，在廿二街興建了中華會館社區活動中心。由於其位置不在主要街道上，附近停車位

置不多，平日使用有限。但其仍是重要慶典不可或缺之場所。七、八年前，市政府增加此中心之產稅，因當時之會長不諳法令，未付稅致使中心被拍賣，中華會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及大筆資金才將之贖回。其在市政府之周旋能力可見一斑。二年前，和中國城生意關係甚大之公用停車場由州政府收回轉租給私人，中華會館亦無力阻止，反而是由個別商人出錢出力將其保留。由於中華會館未能發揮其功能，許多會員甚而拒繳會費，近年來經費除產業租金外，主要來源為「安良工商會」。

安良工商會為芝加哥最大之「堂」，擁有約一二〇〇個會員。其中以梅氏勢力最大。主要收入來源為賭博、會費及一些不動產之租金，為芝加哥最有錢之中國組織。協勝工商會則是芝加哥勢力較弱之「堂」，其總部原在芝加哥華人最早聚居之地區（Clark & Var Buren）。一九七〇年聯邦政府徵收其土地後，轉移陣地到北邊之Argyle Street。於Broadway及Sheridan二街之間購買了不少資產。想另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城。此中國城一直到最近幾年，由於越南難僑之擁入才發展得稍具規模。在此之前，協勝工商會所經營之賭場不但被警察搜捕，亦遭鬼影幫搶劫，其所擁有之房產在金錢上亦頗有損失，可說十分蕭條。

這些組織，雖然勢力不如從前，但因其歷史淵源，仍有相當之號召力，社區也給他們適當之禮遇。但越來越多不屬於這些組織的團體應社區之需要而出現。新的團體多由學生和專業人員所組成，如律師、醫師及社工人員。他們或因職業上之需要，及對某些理想之投入，而致力於改善中國城。Thompson（一九八〇）稱之為「新中產階級」（The New Middle Class）。認為其為將海外中國人社會組織從以血缘、地源為主之分節系統（Segmentary System; Crissman 於一九六七年提出）轉換成以階級（Class）關係為主的結構之主要動力。其中最受人注目的團體為華人諮訊服務處（Chinese American Service League）。由三位社工人員於一九七八年創立，短短幾年中，工作人員增至二〇餘人，成功地從州、市政府及私人組織爭取到各項補助經費，在中國城提供職業介紹及訓練，個人及家庭諮商，老人服務，健康輔導，移民手續等多項服務，取代了中華會館等組織原有之多項功能。事實上，

早在一九七一年，芝加哥市政府即給中國城補助經費設立服務中心，但因中華會館用人不當，成員既乏工作經驗，官僚作風甚強，且有收受賄賂之嫌，頗招埋怨。這些年輕專業人員的投入，頗受居民之好評。中華會館組織對之則有較複雜之反應。他們固然高興有新血輪之加入，但因他們是既得利益之團體，這些新的團體，若地位經過認可，無疑是在削減他們已經在減弱中之勢力。

## 五、芝加哥中國城未來發展展望

### （代結論）

芝加哥中國城內組織勢力無疑的在轉換中。由宗親會、同鄉會及秘密會社為主之組織，已逐漸喪失其重要性。早期由於美國社會的排華及中國移民本身之特質，中國城十分孤立，移民在多方面均需仰賴此等組織，相對的此等組織對移民有相當之控制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社會較平等開放，各種排華法案亦相繼廢除，第二代華人有機會在美國立足，不再依賴中國城謀生，此等組織之控制力日漸減弱。而由於其組織之保守，已無力處理因中國城之開放而逐漸需與美國社會互動之許多事務。對一九六五年後新移入之移民而言，此等組織亦不敷所需，而由以專業人員為主之新組織所替代。但由於此等組織曾提供中國城內必要之服務，至今仍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很多新組織之成員為在中國城出生之第二代華人，他們雖然熟悉中國城人事之利，但也因為如此需對老一輩禮讓三分。真正在重要決策上，影響力仍然有限。但由專業組織替代傳統之商人組織之趨勢，是社會進步之必然現象。中國城組織勢力之轉移雖然溫合（新社團成員着重與舊有組織合作，避免衝突），但已明顯地看出他們勢力之增長。在很多與中國城有關之活動中，新社團之中堅分子均扮演重要的角色。Sante Fe 社區計畫之最後之委員會，即由與舊團體關係深厚之新興代為首。芝加哥中國城目前新舊組織間之和平，並不表示沒有潛在之衝突，其勢力是否能順利轉移，無疑地對中國城未來發展具有決定性之影響！

【本文作者為政大社會學系客座副教授】

## 附註

註1...中國城居住狀況將在近期内獲得改善。前年在中國城北佔地三〇萬畝之 Sante Fe 鐵軌地出售，中國城居民組織了委員會，以七二〇萬美元購得所有權，籌備興建一以一八〇戶樓下商店樓上住家為主之商業中心，及一二〇個單位的老人公寓。在商店住宅中間，將有一100×550呎之林蔭道，可供居民打球，放風箏及溜冰之用，除此之外，原有之 Sante Fe 車站建築物將改建為新社區活動中心，這個耗資七億美元之計畫將於一九八九年完工。密度居全市第一之中國城之居住環境將可獲得部分之緩解。

## 參考書目

- Barth, Gunther  
1964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ack  
1980 *The Chinese of America: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Present*.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Conroy, John  
1978 "The Dark Side of Chinatown", CHICAGO, 27(5): 113-119, 184-194.
- Crissman, Lawrence W.  
1967 "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MAN 2: 185-204.
- Gibbons, Margaret  
1969 *The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Chinese in Chicago*.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ee, Russell  
1973 "Patterns of Community Power Tradi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n Chinatown." in *Ethnic Conflicts and Power: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onald E. Gelfand & Russell Le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Lyman, Stanford M.  
1968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to America, 1850-1960." PHYLON 29: 321-330.
- 1974 *Chinese 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oy, Susan Lee  
1978 *The Chinese in Chicago: The First One Hundred Years 1870-1970*.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 Morton, James W.  
1973 *In The Sea of Sterile Mountains: The Chinese in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J. J. Douglas.
- Patterson, Orlando  
1975 *Context and Choice in Ethnic Allegia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ribbean Case Study*.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Edited by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u, Paul C. P.  
1952 "The Sojourn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34-44.
- Thompson, Richard H.  
1980 "From Kinship to Class: A New Model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URBAN ANTHROPOLOGY, 9(3): 265-293.
- Tung, William L.  
1974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20-1973: A Chronology & Fact Book*. New York: Oveana Publication Inc.